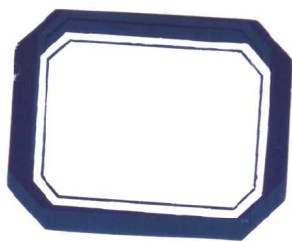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社会空间



未来 生存空间

杨东平 著 ■ 上海三联书店 ■

未来生存空间

著 者 / 杨东平 葛剑雄

责任编辑 / 赵立新

特约编辑 / 郑俊彦

装帧设计 / 苏晓东

责任制作 / 沈 鹰

责任校对 / 达 微

出 版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20)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

发 行 /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

上海三联书店

印 刷 /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

装 订 /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

版 次 / 1998年1月第1版

印 次 /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/ 290千字

印 张 / 14.25

印 数 / 1-20000(全二册)

ISBN 7-5426-1127-5

C·9

定价 27.2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厂质量科联系。T: 56628900×13



杨东平

好书 永不寂寞

人类始祖蹲踞在篝火旁，将人与自然共处的方法，人类繁衍的秘密——口授给他的子民。后来有了文字，有了纸和笔，几千年口口相传的智慧便被记录在书中，流布市井村野，任世人同享文明的盛宴。

薪尽火传。书籍承载着人类的智慧，代代传扬。

信息爆炸的年代，选择变成一项艰深的工作，传播受到信息碎片的无情干扰。书界策划人的使命，便是了解你的索求，尔后请优秀的作者掌勺烹饪；便是把思想者的哲思，策划包装成色香味俱全的佳肴，摆放到你的面前。

在读者与作者之间，书界策划人用真诚架起了一座沟通之桥。

下个世纪我们将面临什么？对这个关系每个人、每个家庭乃至全人类的严峻话题，任何耸人听闻的危言和盲目的乐观都是非理性的。惟有直面现实，并在专家的导引下深长思之，才能真正有力地把握今天，走向未来。

让好书陪伴我们一生，永不寂寞……

阿正



走过20世纪

世纪末的中国 在文明的晚霞和朝霞的交互辉映下，别有一番韵致和气象。

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任务在世纪初和世纪末是基本相似的——民族的生存空间需要保护和拓展，社会的文化空间需要创新和重建，我们的心灵空间需要滋养和充实。

而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我们告别20世纪，也就意味着告别战争、恢复理性，弘扬人性、走向和平。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纪。对于和平，我们作好准备了吗？

当我们从农村走进城市，从“单位”走进市场，从家庭走进社区，从中国走向世界，我们不仅变得富有，在精神的尺度上也变得高大。地球变小了，我们的沟通和交往从未这么方便；与此同时，在信息时代的“数字化生存”中，我们倍感孤独，不知道丢失了什么。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矛盾，因高技术时代的高感情需求而格外焦灼。我们需要适应现代，也需要反省现代；我们需要批判传统，也需要珍惜传统……

面对新世纪，中国所遇到的问题，也是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。在人类文明面临巨大转折的关键时刻，中国从传统现代化模式中的“突围”，奠定中华民族在下一个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，是她可能对世界作出的真正重要的贡献。

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充满信心，有理由对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充满信心，有理由对中华民族的文化、智慧和生命力充满信心。毕竟，我们已经走过20世纪……

目 录

1 城市和乡村

城市化：20世纪的进程	3
谁是农民，谁是外地人	7
文明的冲突：城市和乡村	12

2 大门口的陌生人

城市社会分层：收入差距	23
都市新人类	29
告别“单位”	34

3 现代化的瓶颈：人口巅峰

人口增长：现实和未来	45
代际冲突和独生子女的一代	51
银发浪潮滚滚来	58

4 茶馆的消失：交往的空间

不仅仅是茶馆的消失	65
电子媒体和“数字化生存”	67
学习说话：关于谈话节目	75
民间社会的复兴	80

5 婚姻和家庭生活

家庭的感觉依然温馨	91
“爱之病”：保卫婚姻	96
性别角色的危机	103
信息时代的“女性优势”	110

● 幸福的感觉	
● 不再浪漫?	119
● 生活中什么最重要	124
● 幸福的理念	128
● “小布尔乔亚”的新生	132
● 文化重建的使命	
● 政治、经济和文化	143
● 未完成的使命	146
●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：正在加剧的冲突	153
● 传统会消失吗?	157
● 传统教育的终结	
● 20世纪的历程	171
● 传统教育的复活和强化	175
● 大学之道	181
● 教育现代化：不仅仅是理想	185
● 国际化时代的中国人	
● 中国人走向世界	195
● 中国人的国际认知	199
●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	206
● 和平与发展的世纪	
● 告别20世纪	219
● 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	225
● 走向绿色文明	232



1.

城市 和 乡村

当中国的人口正在不祥地迈向 13 亿之数时，它庞大的农民队伍也一直在同比例地增长，从 50 年代的 4 亿，增至 90 年代的 9 亿。没有多少中国人对这一事实产生过怀疑，尽管人们看到每一个车站、码头都挤满了汹涌的民工，每一个城市都布满了民工的身影，但他们不变的身份仍然是农民。

这是发生在中国的许多众所周知的不合理的事情之一。直到改革开放 18 年之后，才终于有人出来给中国农民一个“说法”。1996 年 10 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报告告诉我们：作为职业概念，农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。目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有 4.6 亿，其中在乡镇企业工作的达 1.2 亿，进入城镇的达 8000 多万；真正从事农业的农业劳动力为 2.5 亿。以此推算，包括赡养人口在内，我国真正的农业人口只有 4.8~5.3 亿，而非通常所说的 9 亿。^①

^① 《中国乡镇企业报》，1996 年 10 月 15 日。

城市化：20 世纪的进程

在本世纪初，世界人口的 14% 居住在城市，而到 90 年代，城市人口已达 42%，全世界有 21 亿人生活在城市。这个趋势仍然呈强劲的增长之势。在下个世纪，全世界将有 60%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。

中国是世界城市的发源地之一，在 5000 年前就出现了早期城市。鸦片战争之后的 100 多年，伴随着近代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变革，城市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，城市的面貌开始日新月异。

本世纪初的巨变造成城市人口的激增，这既是因为城市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，也由于战乱和农村的凋敝使众多的难民、流民进入城市。天津市的人口 1900 年为 32 万，1912 年达到 83.7 万，增加 1.6 倍。上海市在 1910 年有 107 万人口，到 1920 年则达到 248.2 万人口。民国时期的 1919 年，当时 1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是上海和广州 2 个；50~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有天津、北京、杭州、福州、苏州、重庆、香港等 7 个；25~50 万人口的城市有成都、南昌、佛山、宁波等 11 个；10~25 万人口的城市有潮州、沈阳、西安、长沙、哈尔滨等 30 个；5~10 万人口的小城市有 90 个，包括青岛、长春、大连、太原、贵阳等等；2.5~5 万人口的城市有 192 个，包括郑州、兖州、齐齐哈尔等等。

抗日战争之前，是中国经济和大中城市迅速发展的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。30 年代初，上海人口达到 350 万，天津达到 150 万，广州达到 105 万。大上海的崛起及繁极一时的海

派文化，成为一个标志和象征。

城市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。作为一个富有魔力的大熔炉、大舞台，吸收了多少人的梦想和才华，上演了多少感天动地的悲喜剧。无论我们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作出什么样的评价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：从古到今，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，城市始终是一个人口自由流动的开放的空间，它从不拒绝外地人和乡下人——因为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城市人。

到本世纪 50 年代，城市的这一基本特征在中国发生了变化，从而整个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。以上海为例，1949 年以前，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外地人口迁入是上海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。在 50 年代初期仍有外地人口的大量流入，1951～1954 年，每年仍净迁入 21 万人。从 1955 年起，根据中央对上海改造的方针，动员城市人口疏散和部分工厂内迁。1958 年，开始实行户籍制度，对城市人口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，此后，基本是迁出大于迁入。外地人进入上海的流动被截止了。

在新的体制中，通过农业的积累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的计划经济，逐渐形成后来被称为城乡“二元结构”的格局和“身份制度”。大城市的人口流动被严格地控制和遏制。通过户籍制度、住宅制度、粮食供应制度、副食品和燃料供应制度、生产资料供给制度、教育制度、医疗保障制度、劳动保护制度、养老保险制度、婚姻制度等，城市人逐渐成为一个被国家保护起来的特殊利益群体，与农民构成一种不可更易的对立。城市和农村被严格地区分开来。

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，这成为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决策；另一方面，大致从 50 年代末起，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，

将城市知识青年送往农村、边疆，也逐渐成为一项既定方针，并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达到高潮。

1968年下半年起，遍及全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成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一个转折。在1968年、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，全国“老三届”（66、67、68届）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460多万人；在1974~1976年的第二次上山下乡高潮中，下乡近600万人。从1966年下半年至1978年底，12年中共下乡1623万人，平均每年下乡135万人。广义地看，这一运动还应包括60年代末67.9万名“老五届”（1965~1970届）大学毕业生以下基层、下厂矿、下农场为主要去向的毕业分配。

今天，我们已不难认识，虽然城市被新的意识形态视为革命化的对立物——“资产阶级大染缸”；但这场以“缩小三大差别”、“建设新农村”为口号的群众运动，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思想改造运动，如当时宣传的那样。它的真正动因，正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数次疏散城镇人口、知识青年回乡，无不伴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、职工队伍超编、城镇严重的就业问题等等，是对经济生活紊乱、城市管理失调的一种别无选择的对策，是安置几百万毕业生就业和稳定城市秩序的治乱措施。它不是以农民的知识化、乡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目标，因而具有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向。

人为控制城乡人口迁移的政策实行了30多年，其后果是不仅在经济上，而且在文化和社会观念上扩大了城乡差别；同时，在农村积聚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，并且遏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。这也是一个城市化进程停滞不前、了无生气的时期。在城乡对立的“二元结构”和遏制城市的方针下，城镇人口的比重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仅提高了7.3个百分点，从

1949 年的 10.6% 提高至 1978 年的 17.9%。^①

80 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,这也是中国的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。城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生存空间。

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乡转移,以及 1984 年以后政府重新规定了建镇标准,致使城镇人口剧增。80 年代的城市化程度,从 1980 年的 19.39% 上升至 1990 年的 26.41%。^②

在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上,我们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争论:以发展小城镇为主,还是优先发展大城市?这一争论被圈内人戏称为“羊拉屎”还是“牛拉屎”之争。80 年代城市发展的政策是“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,合理发展中等城市,积极发展小城市”。到 1989 年 12 月,这一政策改为“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、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”,放松了对大城市的过分限制,削弱了计划经济的色彩。大城市规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,表明我们正在走出此前的误区。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珠江三角洲、长江三角洲、渤海湾、京津唐地区,已经出现了城镇密集的城市地带。1992 年,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 27.63%;到 1995 年底,我国设市城市已达 640 个,建制镇 17000 个,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达 3.5 亿,城市化水平达到 29%,比 1978 年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。^③

至 1997 年 5 月,中国的城市已达 666 个,其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 75 个,中等城市 192 个,小城市 399 个。据有关

① 《中国统计年鉴(1993)》,中国统计出版社,1994 年。

② 《中国统计年鉴(1991)》,中国统计出版社,1992 年。

③ 《光明日报》,1997 年 8 月 19 日。

部门预测，到 2000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35% 左右，城镇总人口将达到 4.5 亿。也就是说，将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。

谁是农民，谁是外地人

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，对那些冲破体制束缚而自由流动的劳动者，我们一直有一个极其贬义的蔑称：盲流。记得 70 年代我在黑龙江省下乡时，就见识过这些没有户口、居无定所、靠出卖体力干零活挣钱的盲流。现在想来，他们正是最富于生命力和创造精神的 80 年代农民解放的先驱！

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，乡下人是不许在城里久留的，更不用说就业。农村人向城市的流动和社会升迁，只有两个狭窄的途径：上大学或参军。此外，还有少数人作为保姆进入城市工作。对许许多多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人们，“农转非”、吃商品粮曾是个激动人心的梦想；围绕这有限的指标发生了种种冲突、争夺、阴谋和较量。1984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，终于打破了实行多年的城乡隔离的政策，允许农民自理口粮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。当年 10 月，国务院《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》规定，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业长期单位长期务工的，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，以及保护农民进入城镇从事经济活动和为其提供方便。这是一个将载入史册的里程碑，它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，给部分人以“迁徙自由”，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。随着农村改革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，农民开始浩浩荡荡地进入城市。每年春节前后，全国范围内波澜壮阔的“民工潮”，构

成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。这是一个悲壮的进程。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形成汹涌的人流，挤满每一个车站码头，开始纵横几千里跨地区、跨省市的艰苦备至的流动。长途旅行中不仅有病痛、饥渴、冻伤、踩伤，还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拥挤、混浊和高温，甚至导致人的精神异常和分裂，造成多起惨剧。

据调查，1995年，农村流动人口总规模达到7000万人，其中的36%（即2500万人）进行跨省流动。曾经为我国的工业化做出重大牺牲和历史性贡献的中国农民，开始从城市和工商业获得收益。目前在北京、上海，包括民工在内的外来流动人口，每年均达300万之多。我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，离土不离乡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其他职业的农民有1140万人，离土离乡常年外出务工的有1000万人，走出国门的有1万多人。1994年全年，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汇往家乡的劳务收入达100亿元以上。“川军”途经之处，无不成为“民工潮”的“风口浪尖”。1980年，北京市的外来人口约20万，以公务出差和访亲探友为主。而据北京市1994年11月在全市范围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，当时全市户籍人口1062.8万，而流动人口达329.5万，接近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，相当于城区人口的二分之一强，居全国大城市前列。流动人口中，来自外地农村的259.6万，占78.8%，主要来自四川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南、江西、河北等地。其中15~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成，据说约占北京市劳动力总量的三分之一。^①

“农民进城了！”这曾是本世纪上半叶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中，城市统治者的惊恐呼声，也曾是五六十年代城

^① 《中国妇女报》，1996年5月28日。

市人的滑稽戏中戏谑调侃的基本主题。现在，它成为许多城市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，并引起不同人群、不同部门之间激烈的争论。面对周围日益增多的衣冠不整、身有异味的外乡人，心情复杂的城市人被迫确定自己的态度。

据1996年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等8个城市的调查，33.3%的市民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采取平常视之、熟视无睹的态度，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；25%的城市市民对外来人员持“同情”的态度，因为他们“能吃城里人所不能吃之苦，受城里人不能受之累”；16.5%的城市市民对他们持“讨厌”、“看不起”的态度，对他们最主要的负面评价是“不利于社会治安”。有意思的是，女性对农村外来人口的评价明显低于男性，认为“这是一件坏事”的女性比男性高8个百分点，而认为“这是一件好事”的女性比男性低约10个百分点。^①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对社会秩序、治安和卫生环境等远比男性更为敏感。

1996年，北京商情咨询公司对北京市民的调查，认为北京市存在的社会问题中，严重程度依次是收入差距(92.3%)、外地人影响社会秩序(91.4%)、环境污染(85.2%)、交通状况(82.8%)、物价状况(76.0%)、失业状况(62.8%)、治安状况(50.9%)。城市市民对在京打工的外地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看得如此严重，是耐人寻味的。

也许不能不说，长期以来在国家保护主义下形成的身份优越感也在自私地起着作用。许多城里人说不出口的话是：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看你们把城市搞得又脏又乱。只有当每年春节民工大量返乡，以及整治城市环境、

^① 《中国妇女报》，1997年3月25日。

清理外来人口时，他们才明确地意识到，离开他们，城市的功能已变得残缺。其实城市形成的历史、城市的基本属性就在于移民化——正是移民化的优势造成了城市的巨大活力。在那些东张西望、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身上，不难看到我们祖辈的身影，仅仅在一二代之前。

北京零点公司的调查显示：如果以出生地作为判定“本地人”的标准，那么符合这一标准的北京人只有 70.4%，上海人为 86.7%，沈阳人为 88.7%，广州人为 90.3%，成都人为 93%。^①

一系列调查显示，走进城市的民工，是农村中知识化程度最高、观念最先进的群体。云集在珠江三角洲的百万外来工、外来妹，平均年龄仅 22 岁，其中 18~22 岁的占 63.2%。他们当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15.9%，初中程度的占 66.1%，小学程度的占 17%；而全国农村 15~30 岁人口的上述比例分别为 9.1%、47.9% 和 42.9%。农民工走进城市的目的也很不相同，其中 21.3% 的人因家庭贫困、需挣钱摆脱贫困；30.6% 的人因家乡无地可种，无活可做；42.2% 的人则是不想当一辈子农民，想外出闯一闯，“潇洒走一回”。此外，还有 23% 的人是由于高考落榜等各种具体的原因而离开农村。可见，在这些走进城市的年轻人中，图发展已是第一位的目标，其次才是挣钱。^②

当年青的农民工走进城市，在建筑、道路、环卫等各种又苦又累的岗位上安营扎寨时，也把城市人久已丢失的中华

① 《北京晚报》，1997 年 4 月 28 日。

② 《中国妇女报》，1996 年 5 月 28 日。